

婦女・愛滋・家庭？

紀錄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在台首映座談會

愛滋病一向被視為男同性戀的疾病，談到它和女人相關時，要不是責怪染病的女人是執意選擇吸毒或性工作因而感染愛滋的壞女人，要不然就是憤慨在家庭婚姻中的好女人只因丈夫在外亂來就無辜染病。這種兩極的描繪模糊了愛滋感染的性別、經濟、家庭、族裔、階級面向，也簡化了女人和愛滋的多種相逢故事。

本片是第一部有關女人和愛滋的紀錄片（1994）。在那個對愛滋還充滿誤解和無知的年代，導演訪問了許多不同身分的女性感染者，包括黑人、女同性戀、家庭主婦，分享個別女人從「不覺得自己可能是高危險份子」到感染愛滋後的真實經歷和生活，也在差異主體的異質聲音中拆解了兩極化的性別敘事。

時間：2015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2-5 時（影片長 56 分鐘）

地點：台北市龍江街 281 巷 22 號狐狸野餐地下室

主持：王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引言：荷安珀（本片導演／監製、美國資深愛滋運動組織者）

倪家珍（《愛要怎麼做：愛滋年代裡的女性性指南》編者）

翻譯：丁乃非、黃道明（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王 蘋：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首映和座談活動。因為講的是愛滋的歷史，特別是和女性相關的部分，我們安排了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的幹部倪家珍來和大家談談，家珍當年翻譯出版了台灣第一本談婦女和愛滋的著作《愛要怎麼做》，原作者 Cindy Patton 今天也在場。其實當時中譯這本書的時候是集體翻譯製作，但是我們以前很喜歡集體，覺得個人的名字最好不要出現，現在回頭看覺得非常遺憾，自己好像消失了。好

，先請黃道明介紹這部片子的導演，也是今天的主講 Amber Hollibaugh。

黃道明：大家好，Amber Hollibaugh 荷安珀是個身分很複雜的人，她是知名的運動組織者、紀錄片工作者、藝術家、公共知識份子、以及社群組織者，是「酷兒經濟正義」組織的創始成員，目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的研究員。80年代初期她曾擔任紐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的 AIDS 教育小組召集人，後來主導了男同志健康危機（Gay Men Health Crisis）組織的女同志愛滋計畫。她曾因對女性健康議題的卓越貢獻而獲頒 Dr. Susan B. Love award 獎，她的個人回憶錄專書 *My Dangerous Desires –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 廣受好評，已經成為女性主義經典。剛才播放的女性情慾和愛滋紀錄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是她導演的，1994 年獲得著名的日舞影展自由表達獎，是第一部、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部處理女人和 HIV 的紀錄片。從這一連串的創始成員、召集人頭銜，各位就知道她是非常資深的運動組織者，可是我想特別說的是 Amber 看愛滋的角度非常廣，她總是看到愛滋和貧窮、性別、階級、種族、用藥等等軸線的交織，看到這個疾病是怎樣與社會結構和社會成見連在一起被處理，因而也反映了這個社會的狹隘和不平等。由於愛滋早期完全不被認為和女人有什麼關連，因此 Amber 召喚了很多女性感染者出來，拍了這個紀錄片，呼籲大家注意女人的處境。

王 蘋：先請安珀說兩句感想。

荷安珀：每次看這部片子就有很深刻的感觸，這麼多年來女人和愛滋的關係處境好像從沒改變，特別在用藥和性方面。本來這個片子已經蠻老的，裡面講的東西也應該沒什麼時效了，可是這些故事所反映的女性處境還是沒變。女人的世界和女人要怎樣處理愛滋的問題，好像還是一樣，真令人不勝感嘆。

王 蘋：我們先請家珍從差不多同樣的年代帶出 20 年前台灣面對愛滋

防治的最初階段，這樣可以顯示為什麼我們當時要翻譯《愛要怎麼做》這樣一本婦女愛滋的小書，然後再回到現在來看台灣的改變或沒改變。

倪家珍：我已經很久沒有公開講婦女愛滋這個主題了，的確這是我非常早期的工作，1994年離現在大概20年了，如果從這個影片對照台灣的處境，很多脈絡跟台灣20年前是相呼應的。在愛滋的主題上，婦女是一個隱形的對象，甚至是被怪罪的對象，20年前台灣的愛滋防治政策基本上以恐嚇為主，那時的防治文宣就是病體照，讓你看到這個疾病有多恐怖。當時衛生署長張博雅有一個很有名的名言，就是說「感染愛滋就是活得很難堪，死得很難看，自作孽。」政策上就是把愛滋當成一個很恐怖的道德化疾病。這種說法在表面上也很有說服力，因為像是在影片裡主要反映的是美國基督教為主的貧窮黑人女性感染者，在原來的社會結構裡，這個群體本來就是被人蔑視的，說她們活得難堪，死得難看，也不會激起人們的關注，反而覺得罪有應得。

20年前這個主題剛在台灣出來的時候也有幾種被怪罪的主體，第一個最主要被關注的對象當然是男同性戀者，再過來就是藥癮者，然後就是女性性工作者。從道德面向來看，沒有一個感染者會被當成完整的人看待，她總是片面的面貌，或者就是一個被道德譴責的黑影。究竟這個人的人生是什麼？看不見。我們看了這部紀錄片就知道，愛滋感染其實參雜了非常多層次的面向，可是沒有人願意去做這麼細緻的分析。在防治的論述裡總是用道德論述來說公共衛生，說只要有忠誠性伴侶，一切就都沒有問題。當時我們曾經從婦女的角度出發，跟衛生署官員對話過，他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認為感染的人和病人人數如果不夠多的話，根本就不構成需要被關注的群體。女性的身影，不管從預防或生活或者從大視角的狀態來看，都沒有任何面貌，甚至被認為不是值得關懷的對象。這的確是20年前的脈絡。

20年前婦女和愛滋這個主題在婦女團體裡面也不被當成議題，只有我們這群人關心，像是王蘋或丁乃非其實在這個翻譯編書的過程裡參與了很多，出了很多力氣，很可惜最後手冊以當時團體的名字來出版發行，沒有反映真正出力的那群人，我的名字有出現，因為我是編者，我也是這個計劃的主要策劃人。當時這計畫是在兩個脈絡下出現，第一個是因為這個主題在當時的婦女團體裡不是什麼明顯的主題，卻是我的工作、我的同伴認為是重要的主題。第二，這個重要的主題放在當時台灣的愛滋政策或同性戀運動裡來看——真的，那時沒有同志，都還是同性戀——這個疾病帶來的衝擊加上台灣政策的道德污名化，可想而知在原來同性戀的污名之上又增加了另外一個很大的污名，就是同性戀就等同於愛滋。

這個連結不是只有發生在台灣，很多國家在愛滋早期都有同一個迷思，就是禍首是男同性戀者，所以對於當時的個別同性戀者或是小型的同性戀團體來說，出櫃當然是很艱難的事情。但是1990年代的初期，社群的發展或小型的社團事實上是非常活躍的，不管在大學或大學外面或社會性的團體，社群性都很強，跟現在網路社群是非常不同的。也就是說，以前是有實質的、地理性的、也有在生活層次相互的連結，社群感非常強。好在那時沒有這麼多像現在這樣的認同身分要去形塑，因為形塑的過程往往造成了切割和分裂。也是在那個機緣裡，我跟黃道明認識了，後來就玩在一起。現在這種場景不常見了，但是以前如果你去一個同性戀的聚會或是社群的活動，不管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大家都玩在一起。而且我們這些二十幾歲的人可以和像是王蘋、丁乃非這樣更老一點的人玩在一起，這就是台灣早期同性戀運動歷史裡面非常重要的史實。大家都正青春，有魅力、有知識，王蘋、丁乃非所帶動的那種學術的洗禮或是人生的歷練，對於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的誕生是有關鍵性意義的。

20年前為什麼可以有這種場域，讓我都可以跳出來？我覺得就是因為那兩條軸線的歷史交叉，一條是婦女的，一條是同性戀的。當時在婦女團體裡面，女性的性或是情慾或是愛滋當時還是非常初期萌芽的議題，我們恰好踩到了，大家都知道1993、94年台灣發生了非常多和女性情慾相關的事情，剛好Cindy Patton被陳光興邀請來台灣做演講，那時候她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也做相關的研究，在演講的過程裡提到了她這本書。我們看了以後就覺得在台灣的脈絡裡有介紹進來的意義和價值，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台灣那時候沒有任何以婦女的角度來談愛滋的論述，而我們作為婦女運動的工作人員，自然覺得應該在所有議題上都有女性的觀點。另外一方面，當時的愛滋政策其實對於同性戀社群的打擊非常大，我們不能陷入這種盲目的政策或道德批判裡而不管每一個人在實質關係裡、生活經驗到的具體處境，所以對我們而言，覺得當時很需要去把這本手冊出版出來，因為它具有實質運用的價值。再加上，她那本書的切入點其實是慾望、關係、實際的行為，這也是既有的防治政策裡面完全不談的。

這本書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它並沒有在那樣的年代裡說你必須放棄慾望，沒有說必須禁慾，這個態度正好突破了既有政策的盲點。就像剛剛影片上看到的，美國當時的說法是，只要你是正常的異性戀女性，你是不用擔心的，你是安全的。在台灣的脈絡裡我們的政策說，只要你們是忠實性伴侶，你就沒事。那麼在性關係裡面，最忠實的是誰呢？其實就是異性戀的妻子。但是在婚姻關係裡，性涉及了慾望、權力，它涉及了在關係裡妻子可不可以過問先生的婚外性行為，這些面向通通都是既有政策不關切也不談的，總是假設你只要在道德或理智上、意志上忠實，那就是你的保護罩。但是在實質的生活裡，這個道德矛盾很容易被戳破，因為你發現確實有女性感染者，那她們是怎麼感染的？如果

她不是性工作者，也不施打藥物，她卻感染了愛滋，你自然會好奇她是怎麼了？我遇到的第一個女性感染者就是家庭主婦，非常忠實於她的先生，但是她感染了，她很困惑，但是又遭到婆婆的排斥，因為婆婆相信官方的說法，認為一定是她傳給先生的，懷疑她在外面做了什麼。這是當時台灣的現實。

這本小冊很直接的突破了防治的盲點，直接推翻了防治的ABC三原則，A就是禁慾，B就是忠實，C就是戴保險套，手冊完全把這些原則剔除，直接去談人際關係裡的協商，直接去談各種慾望。從當年到現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有很多慾望和行為大家都在做，可是沒什麼人敢把這些事情拿出來談，甚至不可能細緻的知道在關係裡人們是怎麼玩這些行為，他們又是怎麼協商彼此之間的關係，因為碰觸到非常多的禁忌和迷思。我們覺得這個手冊在這個面向有它非常重要的價值，所以希望實質的把它介紹進台灣，對於這個突破的工作有重要的推進作用，先講到這裡。

荷安珀：對於家珍講的情況，我完全同意。我們這些做愛滋工作的人常常遇到的困境就是想要談用藥和性的問題，但是卻被糾纏在道德辯論裡。一般防治人員根本不講保險套，滿嘴講的都是對伴侶忠誠與否，有沒有婚外情，她們的教材也暗示，要是你是好人，乖乖的，就不會得愛滋；要是你不乖，又幹了不該幹的事，那你就會活該得病。美國和台灣的文化脈絡可能有別，但是基本上的態度都是：感染者都是活該，因為他們幹了壞事，自作孽不可活。其實愛滋教育應該是要和大眾談傳染途徑，談病毒如何擴散，但是大眾從防治人員那裡聽到的都是宗教狂熱話語，都是道德訓示，都是罪惡恐懼，使人不敢正視自己心底不可說的慾望。這些談愛滋的方式從來不是直接面對，而是轉著彎去恐嚇人們，說他們心底的慾望會引誘做壞事，然後就是自作孽，最終染病。當時的防治宣導都是這種瘋狂的對話，從不講傳染途徑，也不講性，而是

講道德，講恐嚇。

王 蘋：好，我把家珍講的稍微跟 Amber 講的連起來。我們是 1992 年開始接觸 Cindy Patton 和她的這本小冊子，然後開始翻譯編寫，中間還發生一些跟其他團體的恩恩怨怨，不管怎麼樣，我們鼓起勇氣在 1993 年 12 月 1 號出版了小冊；Amber 的片子 1994 年推出，拍片的時間顯然和我們編書的時間差不多，非常巧合。但是我們都選擇了同一個立場，就是拒絕從道德的角度切入議題，我們談的都是慾望，都是關係。這本小書從頭到尾就是愛和慾望，中文原名叫《愛要怎麼做》，副標題是「愛滋年代女人的性指南」，我們從那個年代就開始在這條路上走。當年在婦女新知，我們工作室推這個愛滋議題的時候非常非常辛苦，因為這個議題非常邊緣，連我們的公衛體系都覺得婦女染愛滋的人數還不夠多，好像不夠重要，沒有想要管。我們在自己的團體要推這個議題也很困難，團體覺得我們是搞運動的，資源有限，做這麼邊緣的議題，社會大眾都搞不清楚，我們做這個有意義嗎？她們關切的意義不是真的運動意義，而是說有被看見的意義嗎？如果這個運動不被看見，那就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不是你真的做什麼，而是怎麼樣才能被大眾理解。我覺得這個歷史應該再重新爬梳一下，去看看這些真實的狀況，但我想暴露一些當時我們內部經歷的事情。我們那個團體是有理監事會的，我們要向理監事報告要推什麼議題，她們同意以後撥經費和預算才能做這件事。雖然這是一本小書，當然還是需要一些預算，我們在報告的時候就必須先在自己團體的菁英婦女知識份子面前做一個教育宣導，跟她們說清楚什麼是愛滋和為什麼要做婦女愛滋的議題。我講一件真實的狀況，現場的高級知識份子女性問我們一個很可怕的問題，這個問題還算不上道德立場，就連基本的傳染途徑她們都非常困惑，她說：「我在學校工作，如果學校有愛滋感染者，他用完飲水機，現在我去用那個飲水機飲水，會不會傳染愛滋啊？」各位可

以理解這本小書很有必要性，她們都需要好好看看。這是 20 年前的往事，但是我相信 20 年後還有人是這麼想，我覺得我們真的要面對的是，為什麼現在還有這麼多對愛滋的恐懼，去除不了？它是建基於什麼樣的國家政策？建基於什麼樣的民間思維？這真是需要分析的。

黃道明：家珍和王蘋當時是最早投入台灣愛滋運動的，而且這個歷史今天都很少人談，但是我要給它一個歷史定位，而且這個定位是現在的運動都沒做到的，因為她們那時檢視篩檢政策除了要求匿篩管道外，更抨擊製造、強化愛滋污名的強制篩檢政策。目前的愛滋運動老實說過了 20 多年還沒有超出當時王蘋和家珍的眼界，依然避談強制篩檢。這本書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有典藏，許多圖書館也有，大家可以找來看看。真的很值得一讀。

梁俊文：我是中央大學英美所碩士生，今天很開心看到 Amber 這部片子的首映，其實我腦中有很多問題。剛剛王蘋問愛滋運動的現況建基在什麼樣的民間思維和政策思維上，我其實有個例子，我在劇場工作，最近可能 12 月的愛滋世界日剛過，所以有很多民間團體或是劇場剛好搭上這條線，推出一些相關的戲劇製作。其實愛滋相關的戲劇或是同志情慾相關的戲劇一直以來都有，可是我最近有些不一樣的觀察，昨天我去看了一齣戲叫做「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它是從電影改編成劇場作品，那個劇團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也會跟愛滋感染者權促會一起合作。另外還有一些劇團也會選跟相關愛滋機構做合作，比如說螢火蟲劇團就會去跟紅絲帶基金會一起合作，露德也合作過一些團體。除了劇場作品之外，還有很多微電影，甚至紀錄片，我們姑且不去談紀錄片是否呈現了愛滋的全貌，但在 Amber 的紀錄片裡，我一直在觀察她的敘事是怎樣鋪陳的，比如說，她提到愉悅和危險之間的張力。去年 Carole Vance 來台灣時對救援人口販運紀錄片有一個

批判，就是說現代紀錄片往往變成了煽情片，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這部紀錄片，我覺得很有幫助。我想要問的是，這部影片也 20 年了，當時一定有很多機構回應這部影片，經過了 20 年之後，這些機構有沒有做出不同的回應？有什麼樣子的改變？或者是什麼樣的效應使得他們的立場改變了？最近我也在觀察，過去何春蕤老師喊「我要性高潮」作為一種主體改造的運動模式，但是現在的愛滋運動並沒有主體改造的現象，我就在想，運動作為一種指導的力量，它和其他領域比如我剛才說的劇場領域或是藝術工作領域是不是可能互相有一些影響？

荷安珀：你提了好幾個問題，我一個一個來回答。這部片子推出的時候有很多爭議，主要是因為它直白的支持女人——包括女性愛滋感染者——擁有性、擁有慾望，這是非常激進的。片中主要的敘事者 Janice 說，我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享受愉悅，如果我想要做愛，我就會去做。當年的女性感染者還敢說這樣的話，太不可置信了。很多電視台不願意播這部片子就是因為太露骨了，而且還有女同性戀出現在片子裡，雖然沒有直接談女同性戀，但是只要有她們露臉，那就是有問題的。所以這部片子當時被視為非常危險。其中很關鍵的就是一開頭的減害教育場景，人們被問到是否有做某些性活動，如果有，就坐下，結果除了兩個還沒到 13 歲的少女之外，全部女人都坐下了。雖然沒公開任何私人的資訊，那個現場已經顯示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鴻溝，女人被社會規範應該過的生活和她們實際活的方式，顯然有很大差距，而這樣誠實的呈現是很激進的。

很不幸的是，這部片子現在幾乎被埋沒了，人們也不再談婦女和愛滋，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運動團體在推片子裡當年推的這些議題。這可能是因為愛滋運動主要是男同性戀主導的，雖然也有婦女運動，但是她們非常討厭甚至鄙視這部片子。她們說我不應該讓主要敘事者說自己明知丈夫是感染者

還跟他做愛，就算主角提到這件事，我們製片人也應該譴責這種行為，反正我們就不該用這位女性的聲音來講述這部片子，因為人家看了會覺得所有女人都很愚蠢。（聽眾大表驚訝）是啊，我們當時聽到這些評論也快瘋了，真不可思議。而且女性主義運動還拒絕提供資金讓片子能夠廣泛播放，其實有錢的女性捐款者很多，可是她們都不願意捐，因為覺得片子太肯定「性」了，她們說拍片應該著重於女性如何受害，可是我們在片子裡卻說女人不一定是受害者，也不應該繼續安於受害者的位置，那些捐款者當然不會支持這部片子。現在這部片子幾乎完全沒有放映的機會，因為也沒有社群和情境願意找出它來使用它，我們過去做的那種組織工作也沒有了，現在經費上億的愛滋組織也不會想要放映它，所以除了政府或機構願意放映，這部片子已經完全不見天日，說不定根本就沒多少人記得這部片子存在。此刻的愛滋運動真的很不一樣了，比起 20 年前，人們現在或許承認女人可能感染愛滋，但是女人仍然不被看重，女人感染愛滋也不被當回事。

黃道明：可以把這部片放到網路平台、擴散影響嗎？

荷安珀：可以啊。如果你有辦法搞，就去做吧。好像中國大陸已經有人在做了，目前是以非官方的方式透過酷兒和拉拉的管道在傳播，所以應該是有辦法的。我和另一位製片人都會非常希望這部片子重見天日得到第二春，當年我們投入了很大一筆錢把片子拍出來，從來沒賺到什麼，要是人們願意繼續傳播它，歡迎使用。

Nina：我想要問資源分配的問題，我是荷蘭烏特列茲大性別研究博士，剛回到台灣。我在荷蘭看到他們做愛滋宣導，和台灣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的愛滋體系是放在公衛裡面，公衛則把它當作一個疾病在處理，主要方式就是防治和防毒，現在更是罪犯化；目標人口就像王蘋講的，女性的數量很少，

所以就把男同志和用藥者當成是主要的目標人口。首先，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階級問題，比如說需要免費提供保險套或是交換針頭的人，可能根本沒管道拿到，或者就算拿到也有危險，因為他就被列入觀察名單，這對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擾，更別說這些都不把女人算進去，不願意花錢在女人身上。第二個感想是，我覺得在台灣要做女人安全性行為這個工作現在越來越困難了，之前我到一個天主教高中女校去教性別平等教育，我想跟她們談婚前性行為，告訴她們怎麼使用保險套，但是馬上就受到關注，我跟校方說這其實也在教女生防治性病與愛滋，但是校方就說，不會，我們的小孩是信教的，未來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其實，當女人要去談愛滋或性病的時候，很多時候不是在談這個病，而是就像 Amber 講的，是在處理女人的性，就是女生可不可以主動？她們可不可以有性關係？等等，可是要談這些，在台灣好難喔，現在還有很多宗教團體的聯盟擋在前面。美國也有一些聲息相通的極端宗教組織出來說要回到過去禁慾的做法，我想問，現在美國高中或者中學有沒有在做這個部分？是怎麼做的？我們還是必需討論到女人什麼時候決定要性，然後要怎麼做，這是我覺得不可能不談的，不能只把它當作一個疾病在處理。

荷安珀：在美國愛滋擴散的初期，我們這些性激進份子或進步份子還可以推廣性教育，因為當時政府想到人人都可能感染愛滋就抓狂，因此願意嘗試任何方法教育群眾。但是最後的結果也並不理想，因為那種急就章的性教育也沒想通要怎麼做，例如就沒有持續的從幼稚園到高中的一貫性教育，而且要修這個課還得家長簽字，這就不容易，再加上教育者自己本身執行性教育時也很不安，因為她們自己都沒好好的受過專業訓練，給了她一本解剖的書就要她上陣講一大堆不同的性問題，真的很難。另外，性教育也有階級之別，富裕學區的學校很有錢，就會開一堆花俏的性教育課，窮學區的學校就什麼

都沒有，可是政府也不管這些。現在右翼又當道，更不能講性教育，政府也不生產發放相關的性教育材料。疾管局針對特定人口會準備一些安全性行為的材料，但是真的很少，像現在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 50 歲以上的老年人是新感染人口中的大宗，於是疾管局開始從性和老年的角度談愛滋，準備了一堆宣傳單張，可是不知道要拿到哪裡去發放。他們不敢去老人中心或養老院發，因為一般人不認為老人還有性愛需求或性愛實踐，疾管局也不想承認老人的性行為還很活躍，這種社會因素就阻擾了防治工作的推廣，真的非常糟糕。

賴麗芳：我想問的是，Amber 想要做的教育顯然不是只有侷限在學校吧，如果只是把它侷限在學校教育來做，就會像她說的最後變成很恐怖的做法。我覺得台灣其實也正在經歷這個過程，學校生理衛生教育謎一般的 14 章和 15 章過去是從來不教嘛，可是後來婦女運動談性別議題之後就有一個從性教育轉向性別平等教育的過程，因此現在不是用性教育的名義講，而是用性別平等教育來做，愛滋也是扣在這裏面來做。可是學校教育畢竟還是一個侷限的地方，所以愛滋和性別平等也要家庭教育來做，那就變得更恐怖，因為總是堅持在一夫一妻、忠誠性關係，愛滋就被拿來作為恐嚇的工具。我昨天聽到朋友講一個例子，他不是老師，而是在愛滋的 NGO 工作，去學校演講，都還沒有說要講什麼，學校就跟他說：「老師，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講得可怕一點，嚇嚇他們吧。」現在愛滋教育雖然能夠進到學校，但是就是變成這樣。黃道明處理過類似的現象，像他提到紅絲帶基金會的「愛現幫」會讓愛滋感染者現身說法，可是他的故事就會講成過去年少輕狂，所以現在痛改前非，堅持要戒掉性濫交的習慣。這種宣導從來不會談慾望，只是說不要。另外，我覺得也必須承認，即使教育也會失敗，你跟人家對話，本身就不見得會立即有效，而可能也是失敗的。

荷安珀：你問的問題都很大，我試著回答。性教育需要進行的是能夠觸發討論、挑戰成見的對話，但是我們的社會決不容許這樣的對話圍繞著「性」來發生。我認為談性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不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很複雜，而是因為人類主體就是複雜的，我們渴望的和我們實際做的都很複雜。可是性教育卻是總是簡簡單單的看表面，陰莖插這裡，陰道這樣打開，肛門是這個形狀，如果你把這個放進那個，最後就會生小孩或者會生病。學生聽完這些，懂了這三樣東西，但是對自己的慾望和自己的器官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完全不知道。我們當然需要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但是性教育也需要跟我談性！不能只給我一堆生理資訊。生理資訊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談慾望，不談情色，不談幻想，不談危險，那就只是生物學，不是談性。當然生物學知識有其重要性，因為你得懂自己的身體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很多人都因為不清楚自己的身體極限而付上極大的代價。但是要了解性，就需要實踐它，想像它，雖然害怕它，但是仍然決定繼續做下去。要針對這些方面來談性，我們就需要一種很不一樣的教育，和此刻所進行的性教育截然不同。可惜到目前為止，我沒見過任何人或國家嘗試往這個方向嘗試。

賴麗芳：現在的教育就是保守派和進步派爭奪性別平等的詮釋權。我覺得這裡很重要，大家在爭戰性道德，看誰可以拿到學校教育的主導權，可以去宣傳他們認為對的性教育觀。大家都在說自己對，可是兩邊也有一個共通性，因為背後的婦女運動歷史就是奠基在「反性」上，所以就會把身體區分成敏感部位、禁忌地帶、和可以開放的地帶，用這個方式區分身體領土，然後教導你有些地方特別不能讓人家碰到。這其實就是性侵害和性騷擾犯罪防治的語言，而這個模式可以很容易地跟保守派接合在一起，因為雙方都在談女性受害，甚至現在性少數也納入了這個受害者的框架。既然性別平等教育就是教大家如何保護受害者的身體，保守派和進步派基本上沒什

麼好吵的，他們的論點是可以互通的，過去在學校裡也都可以和平共處，沒什麼矛盾，但是現在就激烈的吵性道德，看誰可以坐主導的位置。

荷安珀：我知道女性主義老將 **Carole S. Vance** 前幾個月曾經來中央參加性／別廿年會議，她在 1983 年編出專書 *Pleasure and Danger* 並非意外，這本書指出女性主義不能只說女人的位置充滿風險和恐怖，女人也應該可以擁有慾望和情色愉悅的可能性，這樣才能享受完整的生命。女人不能只躲在某個飄渺的地方，永遠擔驚受怕，以為什麼東西就要來戳刺你，而你會因此喪命。你需要知道真正的危險何在，才能在危險中仍然找到愉悅，享受生命；你不能逃過你應該面對的事實，它們可能像亂倫一樣，難以啟齒，萬分痛苦，但是這並不表示你就要放棄你的身體，放棄你可能擁有的愉悅。你不能迴避那些可怕的事情，但是你也必須抓住想像力和慾望的可能性，以便掌握未來，要不然，人生是絕望的，而女人不應該只有絕望。我們認為女性主義必須把性、權力、慾望的可能性當作女性主義願景的一部分，可是通常她們一聽到這話就抓狂了，因此後來 **Carole** 被整得很慘。我認為 **Carole** 那本書裡的東西直到今日都是美國女性主義者不願意面對的，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有關性人口販運的修辭和當年反色情的修辭同出一轍，只是運用在不同的議題上，一個說是賣淫，另一個說是色情，但是語言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只講危險和受害。老實說，女性主義比較喜歡唱衰女性情慾，不願意想像女人的身體可以擁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王 咻：我成為男同性戀是個很有意識的過程，譬如會看著黃道明的書，讓自己性基進化。可是這過程充滿痛苦，譬如每次嗑藥性愛後，還是會覺得渾身骯髒，自我培力那麼久，仍一直活在不潔、不舒服、不被愛、被遺棄種種負面感受及自我污名。我不知道我在對抗什麼，如果我被人罵，我不會覺得怎麼

樣，可是問題是我發現我已經把那一整套東西內化在裡面，當我每天去跟這些愉悅協商面對的時候，我同時也跟一些痛苦、自責、骯髒感共處，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跟它們面對，我也很怕，因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這樣，後來就自殺了，其實我也很怕我會這麼走了。我想問，我可以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我相信是脆弱讓我們更願意聚在一起，願意給予彼此照顧和關愛，剛剛的影片最後也談到這部分，我會比較想知道，假如愛滋讓我們脆弱因此我們願意聚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的這個社群長的是什麼樣子，由誰組成？怎麼運作？然後這個自發、自己加入的社群該跟公權力國家有著什麼樣的距離？是不要國家的任何資源，不要相信國家的任何話，然後完全照著反方向走？好像也不是這樣子，那我們該怎麼去拿捏那個關係？第三個問題，影片的後半段說到愛滋其實改變了家庭成員的秩序角色，甚至情感厚度，看起來它對很多家庭是一個激進的變革。可是我們該怎麼去看待變革？剛看到時可能會反射性的說：哇！很棒啊！革命啦！可是後來我就想到這樣子的變革對很多家庭來說可能是不得以而為之，比如說一個姊姊可能要身兼父母的角色，在各種困苦或窮困中不得不來。那我該怎麼看待激進變革帶來的某種喜悅？當我理解到是有些家庭不願意如此變革時，我該怎麼在認知和情感張力中徘徊？我該怎麼去看待這些事情？這是我的三個問題。

荷安珀：這三個問題恐怕要講一整個晚上。對我而言，恐性文化的悲劇後果之一，就是我們每個人都付上了極大的代價，我們在肯定自己是性主體的時刻，也是我們痛恨自己的時刻。這真是很可怕的代價：成為性主體，而同時痛恨自己。對這個問題，我沒有什麼輕鬆的答案，但是我認為你的描述清楚的說明了為什麼我們需要奮鬥創造一個不再恐性的文化，以便人們不會在享受愉悅的時候這樣責備自己、蔑視自己。要怎麼做，其實不容易想，我也沒有好答案，但是我覺得你能這麼

精準的描述它，這就已經構成很好的理由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努力改變這個現實，這已經不是說別人會怎麼看我們而已，我們自己心中深刻的感受已經太可怕了。第二個問題有關社群。我認為真正深刻的改變應該在社群內部發生，不能等待國家來拯救，也不能靠什麼專家來給我們正確的性知識，解決我們感受到的矛盾。我們必須照著自己的構想，自己來打造我們需要的運動，也只有這樣的運動才能讓我們問出對的問題來找到我們需要的答案。這樣的運動不是一份手冊或一部紀錄片而已，而是群體積極的把性以集體的方式活出來，這件事只有我們才做得到。其實不是只有國家才害怕我們開誠布公的談性，我們自己的社群也很害怕性，害怕對話，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想想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正面迎擊這個問題。我們不做，世界就不會改變。對我而言，這就意味著這件事很可能很尷尬，很困難，但是我們必須試試看，看看會走到哪裡去，我很確定那會是一個和此時此地很不一樣的地方。第三個問題問的是家庭對愛滋的反應。我想愛滋的現實就是家庭發現之後必須面對問題，而每個家庭回應的方式都不一樣，很多家庭會拒絕感染者，掃地出門，斷絕來往。我們在片中拍攝主角 Janice 的家人，是因為他們的反應就是正面面對問題，沒有怪罪 Janice 的意思，反而把這件事當成是全家人的事，因此這個故事顯示了家庭裡的很多互動，甚至妹妹會變成姊姊來照顧大家。但是這個家庭也因此改變了，片子裡沒有顯示的是 Janice 全家真的改變了，全家團聚的時候他們會談愛滋，身上也會印著保險套宣導，他們整個轉變了。當然也有很多家庭努力隱藏感染的事實，控制資訊只讓少數家人知道，而整個家也就因此撕裂了。在愛滋剛開始的那 10 年裡，雖然很多感染者被原生家庭放逐，但是至少我們當時曾經努力打造社群，做他們的家人。雖然沒有原生家庭的愛，你卻可以有後來建構的家庭一樣愛你，看重你，跟你一起並肩和愛滋搏鬥。那是一種非常棒的模式，可惜現在很

少人講了，我們需要創造我們自己需要的彼此照顧，不用倚賴原生家庭的接納，我們的社群可以來補位做你的家人，這也是當年我們運動所做的努力。

黃道明：我想回應一下王咻，我覺得我也沒有勇敢到哪裡去，生活也充滿矛盾感受，所以相信我，你不孤單，一定很多人是這樣子，但怎麼把這些人找出來、找出支持力量？我覺得應該是像 Amber 剛才講的，就是我們要自己來創造一個社群，如果現在愛滋 NGO 組織搞的東西沒有辦法滿足你的需要，那就自己另找方式創造一個新的東西，可能你們都已經有在做了。我覺得你們這一排人就是我的社群，還好我有這些人在，所以我有能力在這邊跟你們一起推動一些東西。就我的經驗來講，這個很重要，我相信你們有一些自己的朋友網絡，那個也很重要，如何把那些扣環連結，把一些奇怪的人拉來，可能組成什麼奇怪的組織，我也不知道，這個都是因緣際會的。我覺得今天這個場合就是一個可能的開始，像這種場子就會吸引、會聚集一些人來，可能陌生，可能熟人，來到這裡聚集。

荷安珀：我想說，人們常以為研究性的學者或性激進份子大概都已經解決了自己的性問題，而其他人還在奮鬥。這不僅是錯誤的認知，而且是個危險的看法，好像我們一定要已經養好了我們從社會那裡得來的傷，才能在性上面激進。我覺得事情完全不是這樣，我們都是帶傷奮戰的人，我們身上都承載著我們個人的掙扎，但是我們決定面對這些問題，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痛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遍體鱗傷，而是因為我們決定不投降。世界不是完美了，而是我們不想原地踏步，就算要逃走之前，也要先把我們的處境說清楚，把問題挑明了。我真的認為大家對性激進份子或性研究學者的狂想是完全錯誤了，但是我也覺得我們需要說清楚，我們正在努力找尋前進的道路，以我們各自不完美的方式，義無反顧的前進。現在可能沒有全部的答案，但是我們的王牌就是自己。

王 蘋：時間也到了，大家應該聽得盡興吧，今天謝謝大家，也謝謝 Amber。希望大家繼續傳播這部紀錄片裡反映出來的議題和精神。

[逐字稿人員－曾浚赫]